

## 序

元代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独特的、伟大的、不可逾越的、典范的、极具世界历史意义的朝代。

应该看到，迄今为止，各方面对元代的研究还很不够。我想这同元代的特点有关。

元代的特点大致有三个：一是疆域大，因为蒙元帝国是那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二是在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蒙古民族是第一个统一了古代全中国的民族；三是蒙元帝国内部具有丰富的多元语言与多元文化。这三点既是元代的特点，也是研究与认识元代的“难点”。

据我所知，关于元代出版史的研究，国内外基本上还是一片“荒地”。零散的文章也不多见，至于完整的系统的学术著作，田建平学友撰著的这部《元代出版史》实为第一部。从元史研究的角度讲，该书无疑填补了一项空白。

该书对元代出版史首次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探讨和论述，基本上展现了元代出版业的成就、特色和风貌。特别是第五章《元代民族语言文字图书的出版》、第十一章《元代出版技术的进步与发明》、第十二章《元代出版对世界的影响》尤其具有学术上的创造性。具体论述方面，也有不少新的见解。例如，作者认为元代的出版业是对元帝国新的世界观念的反映；对至正十六年（1356）建安刘君佐翠岩精舍刻《广韵》封面、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务本堂刻《全相平话三国志》封面上“乳钉”符号的构图及美学分析，均令人耳目一新。

《元代出版史》的眼界也没有停留在一般人认识中狭义的元代上，而是以蒙元帝国乃至其时由此延及的整个世界为制高点的。作者认为，元代有种新的世界观念。他试图诠释这一世界观念，并依据这一世界观念去探寻元代出版史上一些意义更为深远的问题。这一点很重要，它不仅使本书具备了文化方式意义上的境界；更重要者，而且为读者找准了研究元代出版史的路径乃至方向。

《引言》一开头就引用了令人信服的内蒙古地区考古发掘收获，以及考古界权威人士关于蒙古草原早期文明是中华文明主要起源之一的结论，这就为元代的出版文明奏响了远古的呼唤。这也使本书具有了历史的纵深感。从中华文明的多元性与蒙元帝国内部文明的多元性来考察元代出版史，这也使本书具有了超越现实的意义。

作者的研究触角显然已触及到了更为广阔的学术界面，达到了这些让中外学者们普遍感兴趣的学术领域。我想，这是本书的又一价值所在。这也正是学术研究与知识发现的魅力。

总之，该书在元代出版史研究及其体例、写法诸方面，都是一部填补空白、富有创新的著作。

田建平是我的学友，且在内蒙古大学共事多年。他勤于写作，治学认真。我为他能完成这部新著《元代出版史》而感到高兴，于是便写下了上面的几段话。

林 幹

2002年12月书于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

## 目 录

引 言 .....	( 1 )
第一章 元代的政府出版 .....	( 1 )
第二章 元代的儒学与书院出版 .....	( 23 )
第三章 元代的私家与书坊出版 .....	( 46 )
第四章 元代出版的图书 .....	( 68 )
第五章 元代民族语言文字图书的出版 .....	( 151 )
第六章 元代的版画 .....	( 195 )
第七章 元版善本书例释 .....	( 216 )
第八章 元版本的风格和特点 .....	( 231 )
第九章 元版本的鉴定 .....	( 249 )
第十章 元代的“吴兴体”与“元押” .....	( 272 )
第十一章 元代出版技术的进步与发明 .....	( 293 )
第十二章 元代的图书收藏 .....	( 320 )
第十三章 元代出版对世界的影响 .....	( 370 )
附录：元代刊工姓名首字笔画索引 .....	( 394 )
主要参考书目 .....	( 409 )
后 记 .....	( 415 )

## 引 言

辽阔的蒙古草原从远古时代起就是中华文明乃至亚洲古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苏秉琦先生在其遗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以大量的考古发现为根据，对于内蒙古地区的古代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伟大贡献，给予了完整的论述和高度的评价。他提出，中国古代国家的发展有三种模式，分别为：1. 原生型（指内蒙古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2. 次生型（指中原，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包括之前的尧、舜，其后的秦共五代）；3. 续生型（指内蒙古等地的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以秦汉以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蒙古、女真为代表）。在这三种模式中，内蒙古地区即占其中的两种，而且其影响和文化贡献可称极大。苏先生还认为，中国古代史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再到“帝国”的三部曲。内蒙古地区的古代文化，均是率先进入“古国”和“方国”时代的，还是“帝国”时代的典范。例如，距今 8000 年，内蒙古的赤峰兴隆洼文化，已到了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其文明的起初期超过了 1 万年，“中华第一村”、被誉为原母神的“东方维纳斯”、被我国考古界尊称为“中华老祖母像”的石雕人像以及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玉”的玉玦均属于这一文化层次。距今 5000 年前，内蒙古的红山文化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玉龙等玉质礼器为标志，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原始国家。其中的红山玉龙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成为中华龙文化的

始祖。距今约4000年前，内蒙古赤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则是方国文化最典型的实例。它以赤峰为中心，继承了红山文化，势力已达辽宁、河北和京津地区，与夏朝为伍，是雄据北方的一个方国。苏先生认为，距今3000年前的殷人（殷商的祖先）即源于此。<sup>①</sup>至于后来建立的蒙古帝国，那更是迄今为止人类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大致在中古时代，主要形成于蒙古草原地区的游牧生产方式及其游牧文化，与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农耕生产方式及其农业文明相辉映，相互嵌套，相互促进，从而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的辉煌篇章。<sup>②</sup>

1206年，成吉思汗在漠北建立大蒙古国。大蒙古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最大的帝国。它第一次彻底打通了欧亚大陆，以蒙古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大文明——大域文明时期。大域文明的开启，为当时及今后中西方文明的交流提供了实质性的时空隧道与演进平台，诚乃功莫大焉。1271年（元至元八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建立了元朝。翌年改中都为大都（即汗八里），把大都（今北京）作为元朝的都城。元朝建立的意义，史学家周良霄先生认为有四点：“第一，元朝的大统一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第二，大统一为南北方经济的恢复、交流和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第三，它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上，占有尤其重要的地位；第四，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此外，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产生过巨大的作用。”<sup>③</sup>史学家韩儒林先生认为，元朝社会的特点，“最突出的就

---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29~16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

② 参阅张敬秀、田建平著：《东亚文明系统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③ 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周良霄《序言》。

是，各民族文化通过接触，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出现了多种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特色。”<sup>①</sup>

元代突出地体现了大域文明的特征。韩儒林先生论道：“元朝的中外交通特别发达。陆路通波斯、叙利亚、俄罗斯、欧洲，海路通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波斯湾以至非洲各地。交往的范围扩大了。当时，东西方使臣、商旅的往来非常方便。元朝人形容说‘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同时代的一个欧洲商人也说，从黑海沿岸城市到达中国各地，沿途十分安全。这是因为，陆路交通有严密的驿站系统作保障。海路交通方面，元代的航海技术有很大进步。航海者们善于利用季候风规律出海、返航，‘凭针路定向行船，观天象以卜明晦’。他们长期积累的观测潮汛、风信、天象的丰富经验，还被编成歌诀。因为有了这个条件，他们才能航行得更远。明初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只是继承元代航海家的遗业，步其后尘而已。

由于中外交通发达，元朝的对外关系得到了发展，使节、商人往来不绝。中外贸易十分活跃，在中国各大城市，不仅有波斯、阿拉伯商人，而且出现了欧洲和非洲的商人。元代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也具有重大意义。”<sup>②</sup>

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对此也有精彩的论述。

“元朝建立时，成吉思汗时期所奠定的横跨欧亚的蒙古国，除元以外，已逐渐分裂为钦察、察合台、窝阔台、伊儿等独立的汗国，但元朝的皇帝在名义上仍是各汗国的大汗，彼此间还有一定的联系，忽必烈弟旭烈兀统治的伊儿汗国，与元朝的关系更为密切。元朝与伊儿汗国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使臣长期往来不

---

<sup>①②</sup>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陈得芝、邱树森、丁国范、施一揆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韩儒林《前言》。

绝，伊儿汗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各方面都深受元朝的影响。

在元朝统治时期，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它的声誉远及于欧亚非三洲。西方各国的使节、商人、旅行家、传教士来中国的络绎于途。元世祖时，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曾经遍游中国各大城市，并且在元朝做官，在他所留下的游记中，对元朝的幅员广阔和工商业的繁盛作了生动、具体的描绘，激起西欧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由于中外交通的频繁，中国人发明的罗盘、火药、印刷术经阿拉伯传入西欧，阿拉伯人的天文学、医学、算学知识也陆续传来中国。也里可温教（基督教的一支）开始在中国内地传布，伊斯兰教的信徒和清真寺院更加增多了。当时还有不少中国人到达中亚、西亚和南洋等地，中国所造的巨大海船已闻名于世。”<sup>①</sup>

中国的四大发明中，属于中国出版史、中国印刷史、中国编辑史和中国图书史学科内容的印刷术，以及火药、罗盘凡三大发明，都是在元朝经由大域文明之欧亚通道因阿拉伯人而传入欧洲的。

同时，阿拉伯文化及与元帝国有关系的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地区文化也相应地传入了元朝。

从文化史和认知史的角度来看，中外学者对元代的伟大贡献不乏精彩的论述。例如，有学者论道：“但是，从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的立场出发，谁也不能轻视成吉思汗的巨大影响，因为他为中国文化注入了尚带有原始意味的新力量，这种力量又挟汉文化的先进和丰富，向西方世界作交锋和交换，从而把中国的版图扩张到空前绝后的程度，造成了与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

---

<sup>①</sup>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第 118～119 页，人民出版社，1978 年 1 月第 2 版。

及其他各种文化直接会面的地理和交通条件。1000 多年来时断时续的东西海陆交通，这时更畅通无阻，真所谓‘四海为家’，‘无此疆彼界’。这种情况给国外关于中国的知识和观念，带来了三个直接的结果：其一，中国的物文化进一步西传，其中包括火药、罗盘、印刷术、造纸等极为重要的文明，多是在这一时期辗转西传的；其二，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和旅行家来到中国，这些人回去以后口述手记，使国外关于中国的知识大增，甚至造成了国外中国观的萌芽，最著者可以举出马可·波罗和伊宾·白图泰；其三，造成了罗马教廷对于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迫切心理和浓厚兴趣……。”<sup>①</sup>

元帝国的崛起，使“西方人的视野范围突然间扩大了，他们骤然感到茅塞顿开，豁然旷达，获悉天外有天，即在穆斯林帝国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和数量众多的基督教民族，这个基督教民族征服了中亚、俄罗斯、中国北部和印度之后，接着又向波斯和欧洲推进。”<sup>②</sup>

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较之汉唐盛世，领土更加广阔。

元朝中央一级的机构，主要是由“总政务”的中书省、“秉兵柄”的枢密院和“司黜陟”的御史台组成的。主持全国释教及吐蕃地区政务的宣政院，由于其职掌的特殊性，成为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并列的四大军政系统之一。此外，还设有通政院（掌驿站），以及翰林院、集贤院、太常礼仪院、太史院、太医院、将作院等机构。

地方行政机构主要是行中书省。中书省臣被派往地方执政，

<sup>①</sup>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第 70～71 页，学林出版社，1991 年 3 月第 1 版。

<sup>②</sup> L·布尔努瓦：《丝绸之路》第 238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年 4 月版。

称为行中书省事。行中书省各设丞相一人，凡地方军政大事无不统领。元朝政府除以今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为“腹里”外，还相继设置了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11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

行省下设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统于行省。路、府、州、县皆设达鲁花赤（“亲民官”）一员，为其最高长官，称为“监临官”，掌管并督察辖区的行政。

元朝的社会基层管理组织形式为社制和坊里制。

元朝政府在全国设置驿站。全国共有站赤1383处，与驿站相辅而行的还有急递铺。史载当时的交通状况为“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sup>①</sup>

早在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时期，于太祖十年（1215）由辽而仕蒙元政权近三十年，后官至中书令，元代立国规模多由其奠定的契丹族大儒耶律楚材<sup>②</sup>，就以其“尊儒”的政治理念化用于蒙元政权。窝阔台汗即位后，定策立仪制，劝亲王察合台（太宗兄）行君臣礼，以尊君权。蒙古军攻破金汴京（今河南开封）时，废屠城旧制，奏封孔子后裔袭爵衍圣公，并设立经籍所、编修所，渐兴文教。窝阔台汗九年（1237），以守成必用文臣为理由，开科取士，并释放被俘为奴的汉族儒士。有元一代，其间尽管存在过“人分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的政策，以及所谓“九儒十丐”的说法，并且把唐宋时的科举制限定为专以程朱理学为其阈值的科举制，启明清时八股取士之弊陋，而一时不利于儒学文化的发展外，然而从总的方面看，元朝的文化政策，基本上还是以儒家文

<sup>①</sup> 《元史》卷一〇一《兵志·站赤》。

<sup>②</sup> 参阅余大钧：《论耶律楚材对中原文化恢复发展的贡献》，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4期。

化政策为主，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化相互辉映，从而形成了元朝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的独特而丰富的文化景观。

大元帝国的早期创立史上，有两个少数民族人物起了非凡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立下了万世殊勋，他们之中的一个是八思巴，一个是耶律楚材。八思巴是藏族人，耶律楚材是契丹人（他的外祖父是汉族，所以，耶律楚材也可说是兼有契丹族和汉族的血统）。从出版史的角度来讲，他们二人，一人创立了蒙古族文字，一人初步奠定了元朝崇儒尚礼的政治、文化、政育政策，也当是功莫大焉的首辅之臣。

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的北伐军进占大都，元朝灭亡。<sup>①</sup>

元代的出版，概而言之，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五大特点：一、与宋代一起代表了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古典时代，为其鼎盛时期；代表了活字印刷的古典时代，为其奠基时期，承先启后，直接开启了后来活字印刷的先河。二、以蒙古文字作为“国书”的多种民族语言文字用之于出版，呈现了多种语言文字出版的泱泱风姿。三、在空前的时空平台上将其时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出版文化传播向西方世界。四、白话文大量用之于出版，并由此而得以广泛传播，其影响至为深远。五、古典时代的各种著述体裁及其出版大备，简化汉字。



<sup>①</sup> 是年，元惠宗妥欢帖穆尔退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这个政权史称“北元”。北元持续了260多年，最后统一于清王朝。

## 第一章 摇元代的政府出版

元代中央政府主管出版业的最高行政机构为“典领百官，会决庶务”的政务中枢——中书省。政府出版机构有：编修所、经籍所、宏文院、秘书监、兴文署、翰林院，以及艺文监广成局、太医院、国子监、太史院印历局等。太史院印历局还在江浙一带附设了印历局勾管。以下分述之。

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为中书令，常以太子兼领，位居一切臣僚之上，设左右丞相为其副手。中书省的职责为“统六官，率百司，佐天子理万机”。当时中书省直辖“腹里”（今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和 10 个行中书省，而又以 10 个行中书省分辖全国 10 条路，10 个府，10 个州，10 个县，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其绝对的管理权和控制权。

元代官方图书的出版，以及重要图书的出版，都要呈请中书省批准，并由中书省以“牒”这种公文命令或通知具体管理部门或诸路，才许刊行。《天禄琳琅书目·茶宴诗注》记载道：“元时书籍皆由中书省牒下诸路刊行。”这种官刻书籍在出版时，必须把“牒”文列于书的前面。这是一种严格的图书出版审批制度，于此也可见元代对图书出版业的重视。

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讲的正是这种情况。

清蔡澄《鸡窗丛话》云：“先辈云：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

止。”如此看来，地方上个人的图书如要出版，先须经当地主管官员审核批准，再上报到中央管理部门，经其批准后才能出版。加上先由地方绅士看过，所以这其实已是一种类于“三审制”的图书出版审批制度。

其实，从普遍的实际情况看来，这种由下而上申请出版著作的限制，大概主要适用于用公款刻印的书籍，而私人及民间的出版，亦即私刻及坊刻则不受此限。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元代私人出版与书坊出版的自由与繁荣。或者说，这也是促使元代私刻与坊刻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即其出版自由的宽松环境。

元太宗八年（元祐）六月，于汗八里（燕京，即今北京）设置编修所，于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市）沿金之旧制，复设经籍所，掌管、搜访、度藏图书典籍，编辑出版经史类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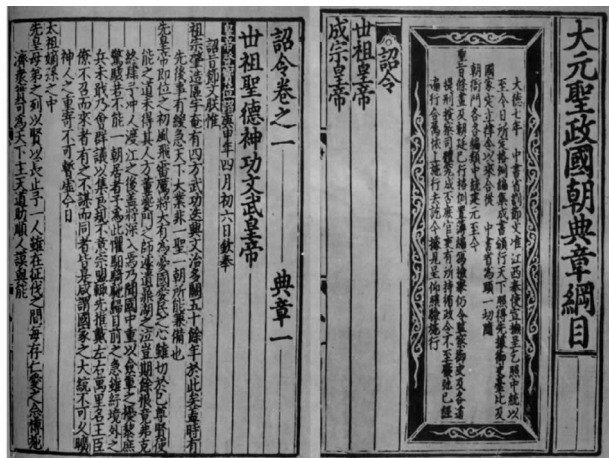
世祖至元元年（元祐），敕选儒生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俸以贍之。至元五年（元祐）敕从臣托果斯等录《毛诗》、《孟子》、《论语》等儒家经典。

至元四年（元祐），将编修所、经籍所名义上予以合并，改称宏文院。至元六年（元祐）徙平阳府经籍所于京师。至元十年（元祐）正月，立秘书监<sup>①</sup>，掌国家图书经籍。同年又设立了兴文署，专掌雕印文书。兴文署设官三员，令一员，丞三员，校理四员，楷书一员，掌记一员，镌字匠四十名，作头一人，匠户十九人，印匠十六人。至元十一年（元祐），以兴文署隶秘书监。

至元十二年（元祐）九月，以伊实特穆尔为御史大夫，据江南诸郡书版及原南宋都城临安秘书省书籍，本监应收经籍、图书、书画等物，江南诸郡多有经史文版，具令收拾，捆载北还，

<sup>①</sup> 《元秘书监志》：“至元九年十一月，太保刘秉忠、大司农李罗奉圣旨：设立秘书监，从三品级。”盖次年正月正式设立。

悉括之而现数不教失落。至元十三年（**元祐**）二月，诏收宋临安图籍典故文字。十四年（**元祐**）十二月，中书省奏，奉旨省并，兴文署并入翰林院。十五年（**元祐**）四月，以集贤院大学



至治二年建阳书坊刊

士许衡（**元祐**—**元祐**，字仲平，号鲁斋，河内人）言，遣使取杭州等处凡在官书籍版刻至京师。又尝括江西诸郡官书板。这些杭州、江南和江西的书板，均为宋版，运到大都（今北京），再以之印书，也就成了元版书了。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宋版元用”现象。它既表明了文化在江山易代之际的传承情况，也为我们提供了历代以来人们在谈论版刻时总是习惯地以“宋元”并举而称之的一种显证。《元史·百官志》云：“至元二十四年，国子监置生员二百人。延祐二年，增置百人。兴文署掌刊刻经史，皆属集贤院。”二十七年（**元祐**）正月，复立兴文署，掌经版及江南学田钱谷，并召集良工刊刻经、子、史，以《资治通鉴》为起端。据王国维先生在其《两浙古刊本考》中讲，从至元十年兴文署初立始，即已开刻《资治通鉴》，为温公原书，不

包括胡注在内，到至元二十七年（~~元统~~），刻成二百九十四卷。是年正月，又开刻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十三卷。据此可知，至元二十七年所刻《资治通鉴》，大概已是胡注《资治通鉴》了。兴文署本《资治通鉴》，清嘉庆年间有胡克家翻刻本。《天禄琳琅书目》卷五亦云：“朝廷于京师创立兴文署，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员，厚禄<sup>■</sup>，召集良工剡刻经、子、史版本，流布天下，以《资治通鉴》为起端之首，所谓识时务之缓急，而审适用之务云云。”

官刻书需经监察机关审核批准。元朝最高监察机构称御史台。为加强对南方的控制，世祖至元十四年（~~元统~~）设江南行御史台于扬州，后迁杭州，再迁建康。下辖江南十道监司。各道监司称肃政廉访司。各道监司监治五六个或十几个路。各路儒学或州、县官署刊行书籍，需先向本路总管府申请，由路总管府转呈本道肃政廉访司。经肃政廉访使审查批准，再层层下转，然后由申报单位刊行。至正五年（~~元统~~），抚州路儒学拟刊行虞集《道园类稿》~~卷~~，先向抚州路总管府申报，经批准由路转呈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由该司主官肃政廉访使审核批准，再依次行文，交抚州路学开雕。至正二十五年（~~元统~~），平江路（苏州）儒学拟刊行《战国策》~~卷~~，则先向平江路守镇分司申报，由分司官佥事核准，再上报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设于杭州）审查批准，然后逐级行文下达到平江路学开雕。

中央一级机关交江浙一带路学刊刻书籍，其刊刻费用需学田款支付的，也要经过一定的审批手续。至正二年（~~元统~~），编修官拟刊行苏天爵《国朝文类》~~卷~~，先呈文给翰林国史院，由该院详准呈中书省和礼部共同议准，然后由中书省发文给江浙行中书省，通知杭州路西湖书院开雕。有些书如辽、金、宋三史，由中书省奉旨直接通知江浙、江西刊刻，也由学田款开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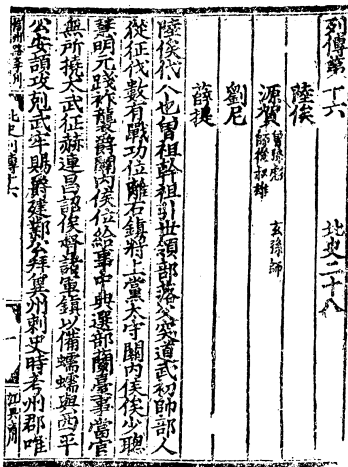
由上可知，兴文署是元朝中央政府直属的主要图书出版机

构。出版的目地，从首先刻印《资治通鉴》来看，不外乎总结历史经验，以巩固元朝江山一途。

据历史文献记载，兴文署早在至元十九年（1282），就曾将《资治通鉴》译为畏兀尔体蒙古文字，并梓行于世了。当时，畏兀尔体蒙古文字是元朝政权确立并使用的官方主要文字。显然，畏兀尔体蒙古文《资治通鉴》主要是提供给蒙古族官僚贵族、色目人中上层人士及其子弟看的，借以了解并认识汉民族的历史。

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二月，立奎章阁学士院，命儒臣进经史。是年又立艺文监，隶属于奎章阁学士院，专以国语（即蒙古语）敷译儒书，及儒书之合校讎者，俾兼治之。同时下设艺林库和广成局，艺林库专掌书籍藏贮，广成局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并专一印行祖宗圣训及其国制等书，设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一人，司吏二人。于此可知，广成局是元朝政府的专门出版机构，在出版“祖宗圣训”和“国制”等书方面具有法定的垄断地位。这些书籍的出版，似乎还带有神秘、秘密和保密的性质。

国子监。刻印过《监本附释音十三经注疏》三百三十五卷，其中包括《周易兼义》九卷，《附释音尚书注疏》二十卷，《附释音毛诗注疏》二十卷，《附释音周礼注疏》四十三卷，《仪礼》十七卷，《附释音礼记注疏》六十三卷，《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



信州路儒学刻本《北史》

十八卷，《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二十卷，《孝经注疏》九卷，《论语注疏解经》二十卷，《孟子注疏解经》十四卷，《尔雅注疏》十一卷，《国语》二十一卷，《伤寒论》十卷。<sup>①</sup>

据历史文献记载，广成局以蒙古文字刻印梓行的书籍极多。如，成宗大德十一年（元祐）八月（时武宗已继位），中书右丞博罗特穆尔用蒙古文字翻译《孝经》，皇帝命令刻印出版，诸王以下咸赐之。武宗至大四年（元祐）六月（时仁宗已嗣位），刊行《贞观治要》。仁宗延祐四年（元祐）四月将《大学衍义》译为“国语”，次年八月在江浙行省刊印缘部，分赐朝臣。延祐五年（元祐）十一月，集贤大学士库春言：唐陆淳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书，有益后学，请令江西行省钹梓，予以出版，以广其传。另外，《列女传》、《经世大典》等书，也都刊印出版过，可惜今已全部失传。尤其是成宗大德七年（元祐）三月，布略齐岳玄等所进《大元一统志》，今仅存残叶几片，明焦竑《国史经籍志》惟载其目而已。

太医院于大德四年（元祐）刻过医书《圣济总录》。至元五年，江西官医提举司刻《世医得效方》二十卷。大德丙午，湖广官医提举刻《风科集验名方》二十八卷。至元五年，建宁路官医提举刻《世医得效方》二十卷、《目录》一卷。此外，太史院下设的印历局，同时于“腹里”、江浙、江西，又设有印历局勾管，专掌天文历数和历书印造出版事宜。可见，印历局也是元朝政府的一个专门出版机构。大概元朝也存在类似于唐宋时民间“私置日历板”而“有乖天授”的情况，以是专设此局，将历书印制出版由国家予以垄断，不准民间私印。

元朝统治者先后采取了尊经崇儒、兴学立教、科贡并举、举

<sup>①</sup> 潘国允、赵坤娟编著：《蒙元版刻综录》第 元祐~元祐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元祐年 苑月第 元祐版。

贤招隐、保护工匠等一系列文治措施。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称“元世学校之盛，远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早在至元初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即令设国子监，以儒学大师许衡为集贤院大学士、国子祭酒，命侍臣子弟入学，并尊吐蕃僧八思巴为国师，命其创制蒙古新文字，颁行全国。至元十四年（1277），又设置蒙古国子监，立蒙古国子学。至元二十四年（1287），立国子学，置博士、教官掌教生徒。以后诸帝，继承了这些文教措施，并有扩充和发展，并分设于诸路、郡、府、州、县。现今的北京首都图书馆，据说即是元朝的国子监所在地。祭酒许衡手植的元槐，枯而重生，至今犹存。此地明、清两代又相继为国子监，辟雍尚完好。国子监除随朝百官、怯薛台（亲兵官），蒙古及汉人官员子弟入学，培养成才，以备擢用外，还承当刻书出版之职。现今能够见到的国子监本，一是延祐（叶德辉《书林清话》作“元祐”，误）三年（1314）出版的小字本医书《伤寒论》十卷（见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及《中国版刻图录》）；一是宋刻元延祐年间补修本《国语》二十一卷。是书首行篇名在上，大题在下，题曰韦氏解，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版心有字数及刊工姓名，宋讳至慎字皆缺笔。元补修之叶，其版的“國”字用简体，作“国”，无字数，有监生某某衔名（按至元二十四年国子监置生员二百人，延祐二年增置百人）。

元朝的出版事业，特别是官方图书的出版，从中央到地方，自有其完备严谨的行政管理机制及体制。

如前所述，中书省是元朝最高的图书出版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大凡重要图书的出版，均得由中书省审核批准，并且颁下所谓特有的“牒”文，才能出版。否则，便是违制违法。实际上，中书省对图书出版的行政管理内容，远远不只如此简单，这从《元秘书监志》中可见其一斑。在兹姑且引用数例。

一、至大四年（1312）七月二十一日，中书省奏准事内一